

“‘理’与‘势’之路”：论神州社《青年中国杂志》的文化建立

“The Road to ‘Li’ and ‘Shi’ ” : Discussion on Cultural Establishment of ‘Youth China Magazine’ by Shenzhou She

王文泉*

(ONG Woon Chuan)

摘要

神州社《青年中国杂志》作为因实现文化理想而创办的杂志，表现了别具一格的中国文化形态。本文以其编辑理念的落实与实践的描述为基础，从创刊意义、杂志内容，以及神州社的文化生活层面来探讨杂志建立中国文化形态的途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体察神州社建立“理”与“势”的文化形态，即通过更具现实实践意义的“生活形态”的策略，以及体现兼爱的“生命情态”的内涵来揭示杂志的文化目的，让神州社完成实现文化理想并创造文化意义的过程。

关键词：《青年中国杂志》、神州社、中国文化、文化建立

Abstract

As a magazine founded to realise cultural ideals, Shenzhou She's 'Qingnian Zhongguo Zazhi' (or 'Youth China Magazine') demonstrated the uniquenes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pattern. Based on the foundation of its editorial philosoph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pathways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agazine from the aspects of its founding significance, content, and the cultural life of Shenzhou She. On this basis, my work will explore the cultural purpose of the magazine, and further examine the cultural patterns of 'Li (lifestyle)' and 'Shi (modality of life)' of Shenzhou She. It is through the 'lifestyle' approach with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the embodiment of 'modality of life' to reveal the cultural purpose of the magazine. This enabled Shenzhou She to realise cultural ideals and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cultural meaning.

Keywords: Youth China Magazine, Shenzhou She, Chinese Cultural, Cultural Establishment

* 王文泉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电邮地址：wwquan@live.com

一、前言

神州社的《青年中国杂志》是上世纪70年代末于台湾出版的文学文化杂志，尽管它仅仅出版三期，然其探讨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其中包括中国传统文学、艺术文化的没落，以及现代中国人的思想迷失，乃不可忽视的命题。这种文化行为并非虚拟空洞的，它透过观照中国文化历史，对“中国”进行了探索与建立，更对广大社会放射文化影响。关于神州社“中国”文化建立的研究，马华文学研究者多集中于对它的产生元素进行剖析，突显它的特质，如：黄锦树《神州：文化乡愁与内在中国》（黄锦树 1998：219-298）的“内在中国”，或通过文学创造特色对它进行归纳，如：钟怡雯《神州：在江湖与古典中寻找中国》（钟怡雯 2001：145-165）的“想象中国”，还有许文荣《神州诗社与文化乡愁》（许文荣 2004：44-48）的神州社与现实政治压抑情绪的“原生意识（文化乡愁）”，以及魏月萍《留学生的认同与实践：神州诗社文学记忆的回望》（魏月萍，2019）的“实践想象”。这些研究成果各异，却揭示了神州社的多面向文化行为。尤其魏月萍的短评，将《青年中国杂志》的文学文化实践与“留学生的境外身体实践问题”相连接，为解读神州社的文化理想实践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她的研究视角更充分突显出《青年中国杂志》作为一份体现文化中国的杂志具有时代性、传播性与生命性。不过，随着《青年中国杂志》的停刊，原本驾驭其上的文化理念与内涵却也被人们所忽略了。有感于此，本文试图以神州社的杂志编辑理念为主要叙述，对《青年中国杂志》的文化实践与内容进行论述，并尝试探讨杂志理念背后隐含的中国文化形态的特征与意义。尤其是杂志所体认的中国文化内涵，在召唤鲜活旺盛的民族生命力的同时，还产生中华民族巩固文化自信的精神力量。虽然《青年中国杂志》的办刊理想就文化建立层面而言，并不具有现实性，但就生命情态价值意义而言，却拥有最真切现实性，从而使杂志展示了一种文化形态与生命形态之间的张力：从文化理想出发，经过文学文化实践，转向了他们追求现实生活形态、实现生命情态的文化诉求。正因为这种非现实的现实意义上的联系与张力，神州社创办“青年中国杂志社”出版《青年中国杂志》，才被赋予作为一种文化目的加以实践与实现，成为中国文化得以建立的文学场域。

二、文化理想的实现：《青年中国杂志》编辑理念的落实

神州社的《青年中国杂志》出版于1979年，第一卷出版了创刊号《青年中国》、第二号《历史中国》和第三号《文化中国》。因着诗社后来在台湾“白色恐怖时期”中被迫解散（杜晋轩 2020：317-334），由此终结了它的后续出版。《青年中国杂志》出版前期，神州社即以向台湾学术文化圈著名学者、作家进行主题采访与邀稿的形式推进，更以其崇高的办刊理想，即发扬民族精神与复兴中华文化为标杆，从而使该杂志深受当时社会各界人士的倡议支持，为杂志发展和整体格局奠定了基础。正如温任平认为：“神州诗社改名‘神州社’，力量涉入文化界，开始印行出版的《青年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国》由于得到学术健笔的供稿（大家都对这群侨生感到好奇），一时颇受看好”。（温任平 2012：18）《青年中国杂志》格局起点虽高，但编辑

理念基于一个贯穿始终的文化命题：从中国文化的内部结构及其症候入手，为它寻求一条出路。在《青年中国杂志》中，神州社的编辑手记〈中国的出发〉一文中提到：“《青年中国》，最大的命题就是从文化出发，在过去与未来，传统与现代，中庸与西学之间，开荆辟棘整理出一条路来，使中国的涵义更深刻，青年的形象更活跃；而中国是年青的。”（曲凤还主编 1979a：267）由此更可以推定，《青年中国杂志》是一份担负着文化使命的文学杂志，它以中国文化的现实处境为观照，同时更融合了神州社与各界同仁对中国文化的情感、体验以及理想，并对诗社乃至文化受众文化建立过程进行引导。在《青年中国杂志》这类以实现理想的文学杂志中，“中国正在壮大成熟·青年勇于实现理想”（温瑞安语）的办刊宗旨，正是神州社的“信念、决心和力行的方向！”（曲凤还主编 1979b：290）那么，神州社通过文学杂志的形式实现理想时，它强调与突显了什么？

无论是《青年中国》《历史中国》还是《文化中国》，都有一个显著核心理念，那就是通过文学杂志探索中国文化，以及从中体现出来的对于人文、历史、文化的态度，甚或它们与文化主体之间的作用与发展。在神州社的编辑理念引导下，《青年中国杂志》被赋予了某种文化功能性：一方面是神州社处理中国文化症结，反思中国文化的摧折去根甚或中华民族的存亡等问题的文化场域；另一方面，《青年中国杂志》还具有感召文化主体文化心理的力量，为缓解与修复大陆与台湾两岸分隔对立的政治僵局，甚至为家国的“统一和平壮大”的前景带来希望，使“中国”在濒临分裂甚或覆灭的状态下得以看见新生的曙光。神州社社长温瑞安在《青年中国杂志》发刊词中谈到：“有人说近百年来中国是一场支离破碎的梦，要只是恶梦还好，醒来就可以忘掉；然而它不是恶梦，而是妻离子散的事实，这事实是要我们牢牢记住它给我们的教训，以致在今后为中国谋求壮大幸福的路向上，不致重蹈覆辙，导致同样或类似的悲剧。从满清的自私无能、割地求和、在帝国列强的船坚炮利之下，中国大陆沦为‘半殖民地’，到大汉民族自救图强，从辛亥革命、民国建立、五四爱国运动、东征北伐、八年抗战，中国一度可以有统一和平壮大的希望，然而曾长久封闭的古老大陆，一旦暴露在西方文明的侵略下，整个社会结构、伦理观念、价值取向遭受极大的摇撼，中国文化传统几被连根拔起，各种未深思熟虑的思想来给当时积弱之中国开药方，结果治丝益棼。”（温瑞安 1979：1-2）在《青年中国杂志》中，为实现理想而生发的“为中国做点事”的文化意念，促使神州社在当时艰难的文化困境中，不断努力实践与逼近理想，从而为中国文化开创了一个新的历程。

因此，《青年中国杂志》一开始，便以中国文化为聚焦，指出文化与文学之间的相互性，其不仅是相互的，而且是主体文化意识和生命体验与意义的组合部分，通过文学途径得以实践。因而，对理想与实践的叙事、文化与文学的功能和“中国”的体认，不仅能完成诗社成员的文化理想，而且还能将此文化理想，以文学的形式呈现出来，达到中国文化形态建立的层次。不仅如此，文学叙述与文化建立的形态，有助于主体与“中国”之间的文化情感联系，提高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达到他们实践理想的初衷：在以文学报国的前提下，理想的实践方法也逐渐明晰起来，尤其是诗社召集一群有志魄的青年，更需要兴发这样合一的“维护一种文化就是维护一个民族”的理想，才能在“为现今或未来中国的寻索思考实践者铺路”（温瑞安 1979：4），形成新的

理想和新的文化。可以说,《青年中国杂志》,除了是神州社文化自觉和实践理想的成果,也是他们对诗社的蓬勃的文化事业的殷切期盼,与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念甚至心理情感是紧密相关的,神州社就认为“最重要的,他们有一颗活泼热诚的心怀,有一份直接参与的态度”。(曲凤还主编 1979b: 290)因此,在神州社的文化理想中,《青年中国杂志》既是他们理想的实践的创造成果,也是他们了解与把握中国文化的整体意义,更是他们用来寄托文化情怀、文化想象、激发情感、改造文化、拯救中国、复兴文化、彰显民族自信、中国常新的文学文化场域。

事实上,根据神州社有意识的文化理想与文学实践,可以体会出以文学方式作为文化塑形的方法,存在着一种理想式的中国文化与文人精神的传统,即是连接式对中国文化的继承开拓,因着西方文化兴盛、现代性的潮流、中国文化的局限性等诸多问题,使中国传统文化内涵逐渐被淡稀。又或者说,神州社认为中国文化是既定存在,它们就摆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被冲击、破坏、湮没,既有传统优良的一面,也有抱残守缺的一面,他们所要探讨的,是如何认识它们,以及在它遭遇各种现代危机之时,如何透过文学的方式,重整它们,赋予它们新命脉的力量,使它们得以更新和持续的发展。因此,关于中国文化的存在,即从两个层面来思考进行:第一是探讨文化、文学艺术与中国的关系。第二是研究中国文化、历史和文学艺术的存在方式。关于中国文化、历史、文学艺术的思考,都知道它们是传统的。但是,这些文化类型只有在与神州社的主体性的文化自觉和审美经验相互结合,并与理想与实践结合在一起时,才能赋予它形象与实质内涵,且富有感化与影响文化主体的文学形式。因为,没有神州社的文化主体情感,中国文化,无论是文化、文学,还是历史、人文,都只是客观存在的文化物质而已。换句话说,神州社《青年中国杂志》处于实现理想与文化情感之中,他们所掌握的文化性质,而通过文学实践将它们当作建立文化的基础。他们在实践与创造时,都需要思想、想象和情感的投入。这种标榜理想的实践,即使多少包含着理想主义的成分,但并不代表他们只是凭空想象。事实上,实践理想是一种文化力量与精神的展现,经常能够跨越想象成为现实的文化行为。当神州社的文化理想与“意识已从模糊的心理憧憬转化为具有强烈实践性的意识形态……中国文字在他们的手上也必须纯化,进行一种貌似还原的再创造,向一个被认为是属于中国的逝去的时代投射”(黄锦树 1998: 243)之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编辑出版的《青年中国杂志》,不仅止文字甚至连理念、内涵、形式也都必须都是纯化的。

神州社肯定了《青年中国杂志》的作用不限于文化和社会,影响也不限于民族和家国。从另一个意义层面上说,文学作为神州社实践和实现理想的形态,不仅带有一种特殊的文化情感,还涉及审美表现性的性质。首先,神州社将文学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实践理想的过程中,将它作为一种能够塑造文化,以及突显情感的一种方式,从而把主体文化的生命能量注入文化、文学中,使它成为具有理性和人文价值内涵的文化形态。其次,神州社在实践以文学塑造文化、显示中国文化力量时,突出自身为文化主体的情感、理想和冀望,使原来浮动枯燥的文化变成一种饱含文化主体生命情感的意味。由此,原本已经被逐渐稀释的中国文化,却突然被赋予了一种文化建立力度的生命情感。正如神州社所意识到的:除了“把文学报国当作自己作为今之书生的抉择之一”以外,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在日常生活中使“文化塑型”,并由此达

到一种“替生活情态寻找一条‘理’与‘势’之路”（温瑞安 1979：4）的文化理想状态。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文化与文学、诗社理念与“中国”文化、理想实现与情感实践之间产生了一种文化机制，而它们的功能性组织也是可以调度、调整和组织。因此，可以发现神州社通过《青年中国杂志》建立中国文化形态的方式，激发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两种不同的文化趋向，一种是文化生活的形态；一种指文化主体的情态。前者规定了神州社文化生活的形式与趋向，后者则赋予他们以文化自信和力量。这也是本文第三节所要讨论的内容。

由此，可以看出，神州社投射的文化理想，侧重于实现的方式：透过文学杂志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内蕴。无论是文化主体对客观对象的“知”，还是主体“知”后能“行”的相互作用与结果，都是在寻找一种有效的实践方法，以利于主体心理与情感的审美感受。正如神州社说，“我们相信，未来中国文化的发展，不只是理性的认知及感情的信仰，而是脚踏实地地以‘知行合一’做起。”（曲凤还主编 1979c：299）另一方面，《青年中国杂志》中的所谓“知行合一”，事实上便是试图通过文学杂志，以体认现实中的“中国”的方式，提升自己内心的民族自信，当推陈出新的中国文化被展示出来时，既印证了主体建立文化的能动性，也引起了主体的内心情感审美之维。正因为是以文学杂志的形式，通过对“中国”的叙说与建立的力量，方才使得中国文化与文化主体情感之间搭建起桥梁，从而催促一种文化情感的积淀和兴发，甚至产生一种“认同与实践想象”。（魏月萍，2019）

如果按照神州社认同与实践想象的行为，还可以从中发现一个显著的特质：经由想象而落实成文学杂志，显然他们一开始就对主体实现理想的作为有一种清醒的认识。从这个层面而言，他们是透过文学文化实践来完成文化理想的实现的。因此，神州社的《青年中国杂志》着重诗社成员的文化实践能力，强调把编辑理念作为展开“中国”文化形态建立的重要方式。正如在《青年中国杂志》编辑工作中，神州社采取各种角度、观点、内容、动机的“中国”命题，都可以解读为实践理想的文化策略。而无论是《青年中国》《历史中国》还是《文化中国》编辑的过程，以实践为目的的主题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实践对理想的僭越。这种文化策略，即突出了以纯粹理想形式存在的文化主体思想，又强调了在主体理想成型以后、将它付诸落实甚或化为现实。例如，以〈文化复兴专文〉和〈建立文化大国专题〉两个专题为例，即可意识到二者在理想与实践意义上的不同性质。从主题看来，它们纯属文化主体的宏大理想，也是神州社希冀未来中国文化的复兴与强大的理想结果。至于他们对宏大理想的特质与意义的讨论内容，实属文化实践的领域。神州社对于实现理想的意识，并非仅止于学院派的理论探讨层面，而是将它们落实为实体杂志的编辑出版，并向社会群众推广“神州”文化的形式。这些实践理想的特殊形式，在《青年中国杂志》中展现无遗。神州社用这种合为一体并同步完成的方式来展现他们在“中国”命题上的文化诉求。这也是中国文化主体的实践意义的体现：召唤中国文化，祛除中国文化历史上的衰颓形势，重构中国文化的历史和形象，并肩负起“如何使中国可以生存在未来的世界里，并且要活得更好”（温瑞安 1979：4）的文化理想。于是，神州社在召唤、祛除衰颓、重构与实践励心志的理想中，完成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实践意义。

三、当代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中国”：《青年中国杂志》的“中国”体认

在台湾当代中国文化语境中，上世纪七十年代是台湾国民政府反共复国意识的高涨时期。随着中国大陆已经共产化，和国民政府反共复国意识的推动，使台湾当时整个社会或校园处于“救国团以及救国团式‘团康式文化’的鼎盛时期”，（杨照，1993）无形中也让处身其间的神州社多少受到反攻大陆、复兴民国的政治文化思想影响。当提及“中国”时，温瑞安即在《青年中国杂志》创刊号发刊词中，认为“今天的大陆在民族、传统、文化、人性上都给予极大的曲解与限制”。（温瑞安 1979：2）由此可见，神州社“中国”的内涵，对文化复兴、民族建立、家国情怀等思想的体现，在很大程度上受影响于当时台湾的中国文化语境。既然“中国”的文化困境是时代与历史造就的，那么他们就必须重新体认“中国”与发现中国文化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至于如何在生活形态实践和生命情态追求中体认“中国”，令它们重新归位与展现特质，这必须对各号《青年中国杂志》及其主题构思和意图进行综合性分析：

杂志期号 主要目录	创刊号 《青年中国》	第二号 《历史中国》	第三号 《文化中国》
专辑之一	从少年中国到青年中国	纵谈历史中国	建立文化大国专题
专辑之二	青年中国的文化与文学 各层次探讨	横观历史中国	神州文化推广专文
专辑之三	抗战纪念专辑	“青年中国在神州”专题	光辉十月专题
专辑之四	中美断交反应专文	文化复兴专文	“我看青中”与读者来函

对总共三期12个专辑主题进行梳理时，可以发现《青年中国杂志》在各大专辑中，将文化类主题与政治类主题并列呈现。诸如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外交关系、中国的节日、中国的文化展望等，都出现在杂志各专辑主题之中。文化类专辑内容的编辑，有利于读者们全面了解“中国”，更重要的是，它巩固了当时台湾社会对“中国”的文化认知。由于神州社对于杂志内容的编辑，都能通过台湾社会现象看中国文化本质，同时还能结合当时各文化界人士对中国文化探究的文稿，颇具深度，由此奠定了它作为一份体认“中国”的杂志。基于“文学是动态的、精神的文化现象，无可避免地与时代的现实发展相互干涉；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变化，各有其复杂的过程，一部份是内在的艺术性求变化所促成，另一部份则是外在的，因社会的、思想的和广义文化的变动所导致”（林瑞明 1993：III）的文化形态，使他们聚焦于“中国”的体认变得更清晰易见。

显然，神州社在杂志中所体现的“中国”，既与他们现实文化生活形态，又与个体生命情态相联系，从而达到“内发”——“青年勇于实践理想”与“外现”——“中国正在壮大成熟”的结果。（曲凤还、黄昏星整理 1979：148）文化理想与文学杂志的结合构成文化语境中的文化政治，包括它赶上当时台湾社会宣扬“复兴救国”时期，形成一股政治话语，且具备一定程度上文化政治功能性质，这是中台历史进程中的时

代局限性使然，虽然贴合时代氛围与脉搏，但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叙事，不妨将它们视为一个时代的表征印记，只取其积极的文化精神部分。因此，神州社在社会风气倡导文学的文化功用性的指导之下，不仅使杂志中的理想与实践之间清晰化，也揭示了文化功能与文学审美的搭配形态，更产生一股自觉于当时主流社会形态的充沛的文化气势。诚如论者指出，神州社的“中国”，“实是指向台湾这个自由空间的场域，那是他们向往文化复兴、反共事业的祖国”，更被他们视为“心灵的故乡”。（魏月萍，2019）根据《青年中国杂志》的基调，“中国”除了指向当时政治文化语境下的台湾“祖国”，同时，它可以是纯粹的古老“大陆”，也可以是“青年”、“历史”与“文化”，甚至是中华民族乃至诗社成员的生活形态与生命情态。

在《青年中国杂志》中，神州社对“中国”的体认方式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以探究“中国”为杂志意旨。这点从它的专辑命题中即可见。譬如，专辑主题总以“中国”与“文化”命题：〈青年中国的文化与文学各层次探讨〉〈“青年中国在神州”专题〉〈建立文化大国专题〉等。而收编于专辑命题下的文章主题内容，则是以探究“中国”式微的原因、背景以及困境，并以体现一个新“中国”为主。比如，朱炎〈动荡世局里的中国青年〉，就是以大陆政治文化、欧美诸国的文化势力、台湾社会歪邪风气等对“中国”造成破坏为批判，再从国家民族、文化传统的关键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目的就是为提醒和鼓励中国青年团结一致，全力展现一个具有自由、民主且能“确保民族文化传统的根本”的“中国”。杨国枢〈创造一个新的中国——青年中国的中国青年〉则明确地指出青年的时代环境与生活情况的“困扰”因素，甚至青年与“中国”传统脱序的挫败无力的感觉，从而提出使中国文化青年化的文化方案，使中国变成一个“青年中国”。

二、“中国”作为文学杂志的论述对象，《青年中国杂志》将它置放到其自身的历史长河中进行阐述，再现中国古代文化特质。比如在综观中国历史时，林清玄〈纵谈历史中国系列之四：不容青史竟成灰——谈有关历史的几件小事〉谈论了中国历史背后的特殊质地、形态、功能，最后总结中国历史内涵中的血缘、“怀念”和“检讨”等性质，促发了人们念祖与延续历史血脉的“中国”心理。又如曲凤还〈文化复兴专文之二：中秋与中国〉在叙述佳节时，呈现出丰富的佳节文化图象：神话传说、诗词曲赋、历史故事等。在探索和重现中国历史时，文章所着手的层面还包括中国思想史、中国电影史、中国绘画史、中国建筑史等。值得关注的是，在展示“中国”历史时，神州社与作者们总是通过各种文化形态进行阐述。例如，王晓波在〈横观历史中国系列之一：先秦思想与文化变迁〉中，指出中国古代从原初农业发展到手工业和商业的社会形态，催生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先秦诸子的思想类型，包括：孔子向往周制、孟子主张恢复井田制、墨子主张“法夏”、荀子“法后王”等，同时，历史发展又与当今的民族文化变革紧密联系。因此，作者认为若要改变中国文化，就必须先有中国民族主义，才得以推动文化变革，改造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文化复兴。这种用文化思想变迁来诠释历史的变更，其体认“中国”的文化目的清晰有力。

除了以上具体的中国文化内涵，《青年中国杂志》体认“中国”的方式还体现在杂志内外部关系上。一是杂志内容的文章作者与采访对象不同，例如中国学术界的牟宗三、钱穆、徐复观、韦政通，文学界的高信疆、朱西宁、余光中、张晓风等。当众多

中国文化人的声音出现在杂志中时，无疑增加了杂志彰显“中国”的力量，他们不仅抱持跟杂志相一致的文化态度，甚至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符号。从〈人物志——《青年中国》第一号至第三号作者编辑简历〉一栏目中，这种把文化人符号化的意图清晰可见。同时，伴随这些文化人的声音，“中国”更被重新体认和阐述。比如〈建立文化大国专题〉专辑在讨论中国文化的特质和意义时，他们所碰触的“中国”就包括内圣外王、民本精神、天人合一、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汉语言问题、汉民族文化等。不论是透过访问对象还是作家文稿形式，这些被突显的“中国”特质多样丰富。譬如，张晓风〈建立文化大国专题系列之十：愈合的桂树——寄拉佛斐尔先生〉，记叙她被一幅异国学人办公室墙上的中国山水画感动，甚至认为画上的中国意象和意境“是典型中国人的梦，数亩良田，几楹草堂，远山近水，而画中，依稀有机鸣桑树颠的声音，有狗吠深巷的声音，有樵子放歌，有渔夫吹箫”（张晓风 1979：96），令她深受感动。除此，她还从中国老画家“年纪”落款，牵引出孟子把年纪当作可令人尊敬的因素，同时，囿于政治文化原因使她为自己年纪三十却不能观“泰山日出，长河日落”而悲伤。由此，心里加倍地珍爱孔子遗训、古代文化、五千年的汉语言、汉民族与家国等，甚至认为遭受政治破坏的中国实际上是中国神话中的“月中神桂”，永远不会被砍倒。后来，她还托人给提倡以道德力量牵制政治的拉佛斐尔先生送去一幅刺绣的花鸟，更相信“神奇的桂树”会高举，而百鸟也会在其上和鸣。无论在文章内容、情思等方面，张晓风可以说融汇了很多中国文化意蕴，用鲜活的中国语言与中国文化形象展示了中国。神州社推崇各文化界人士的声音，无疑扩大了体认中国的广度。

二是接受文化受众群体来函互动让“中国”深化。〈“我看青中”与读者来函〉这一专辑展示了关心“神州”的读者们的中国情怀。通过读者的书信内容，可以发现，专辑中的读者都是心系“中国”的群体。例如，古素娥〈神州、中国、秋海棠〉，自认中国是她“最最敬爱可亲的”，同时自己与神州社的关系就像一家人，因为“我们的血液里流的是同一个母亲的血液，我们的心灵受同一个文化的滋润，我们的生命更是源流于同一个文明古国”。（古素娥 1979：286）又如王伟〈长安不见使人愁〉，除了表达他对端庄、肃穆的“中国”二字的敬意之外，还心怀“多希望每个人都能重回秋海棠叶上，锦绣如花”（王伟 1979：290）的美好憧憬。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杂志中的“中国”已成为读者经历文化的场域，通过阅读接受与信函交流，“中国”不仅就在这种文化互动中得到深化，还达到了读者回归与维护“中国”的文化效果。

从上述分析看，《青年中国杂志》以“中国”为聚焦点，在充分体认“中国”的同时，似乎还达到另一种“经由想象、感觉、感情、知识和哲学的内在组合”的“内在中国”。（黄锦树 1998：222）无论是体认“中国”还是“内在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建立必然立足于某种传统文化的本质与内涵，所以必须在传统文化资源中汲取力量。正是在这种文化自觉上的办刊行为，已是负载了神州社独特的文化意图，是他们在体认中国文化时的策略性表现。

首先，神州社认为作为实践文化理想的文学杂志，《青年中国杂志》不仅突显了中国文化与文学的更新，更着重于它们和“中国”与民族之间的关系。《青年中国》专辑之一〈从少年中国到青年中国〉和专辑之二〈青年中国的文化与文学各层次探讨〉，以及《历史中国》专辑之一〈纵谈历史中国〉与专辑之二〈横观历史中国〉中的系列文章，

是神州社“对不同的（文化）层面作不同的探讨，特别着重的是艺术上的讨论，其中又侧重在文学上的意见。”这个过程实际上等于重新审视中国文化，又重新调整了中国文化的性质。也就是说，神州社对各层面的中国文化的探究，所达到的目的相同，即引发读者的文化反思。因此，这个专辑系列文章探讨的文化层面就产生了“发人深省”的文化效果。（曲凤还主编 1979a：31）

以上两大专辑中被再现的中国文化层面深广，包括文学（小说、散文、现代诗等）、艺术（民歌、戏剧、绘画等）、思想（先秦思想、唐人精神、宋人爱国运动等），就是在现代文学杂志空间中对中国文化的再现，以当代文化批评视角展示了中国文化。例如，温瑞安〈青年中国的文学〉叙述了中国文学从过去朝向未来的进程。这个过程即是对当代台湾乡土文学论战的反思，也可以是对当代中国文学困境的揭露，为中国文学的未来发展提供线索。同时，温瑞安也全力呈现当时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的国策、反共文学等问题，明确地表达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所负载的两岸和平统一的中国民族意识。他一方面把家国情怀和民族意识转移到现代中国文学中，另一方面又让中国文学在时代变化中，回顾、前瞻、塑造，来实现中国文学的文化价值，即塑造一个具有“民族文学的风格与风貌”（温瑞安 1979a：149-150）的时代文学。正如他写于文章主题前“发扬民族的文学·激荡正气的文学”的小题般，他对中国文学的探讨，不再仅止于文学层面的探讨，而是创作富含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与中华民族精神的民族文学。

在〈青年中国的文化与文学各层次探讨〉专辑里，人们还可以看到这种“民族文学”叙述背后对中国文化的体认。方娥真〈儒者武者与侠者——兼谈青年中国的诗、武、乐〉、周清啸〈散文的新义——青年中国的散文〉，尤其陈剑谁在〈表现现在，展望未来——青年中国的小说〉一文中，认为神州社所提倡的“民族文学”的小说，不仅能够容纳异己，还必须是真正具有“中国的民族意识”。她说：“青年中国的小说，它所要求的不只是在基本心态上要代表中国，而且要在真正的作品代表这一时代的中国。”（陈剑谁 1979a：129）这种文化思维只能是中国式的文化形式。所以，在这个倡导中国传统文化态度的过程中，传统的中国文化化身为现代民族文学的创作意识，即“试图把目前柔靡、颓废、枯燥，或者纯学理、学院、学术以及自怜、自大、自矜的文学，融汇到与时代与中国与民族息息相关的主流里去！”（曲凤还主编 1979a：267）所以，在为民族文学开路过程中，神州社不断追求中国文化的更新形象和意义，而罔顾走这条文化之路的“艰辛”。

其次，神州社的办刊意图还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继承上。在神州社的《青年中国杂志》中，古代中国精神成为他们体认中国的最好的文化内涵。尤其印刷在三期杂志封面上的秦始皇、司马迁、花木兰、岳飞等，在这里，古人风范成为他们钦慕古代中国精神的符号。这里的古人形象，或英勇或不朽，实际都暗含神州社对中国文化的召唤和情感。可以说，这些“古人”都是神州社文化心理中的“中国”，而对“古人”形象的推崇实际上也是神州社对文化精神承继的一种象征性行为。于是，神州社把“中国”转化为他们意识中的“一部中国历史，便是先民们集体智慧的总体现”（神州诗社编 1979b：11）的古人精神，所以才有《青年中国杂志》里的各种古代文化精神与价值。

《历史中国》专辑之一〈纵谈历史中国〉和专辑之二〈横观历史中国〉,《文化中国》专辑之一〈建立文化大国专题〉系列文章,使古人思想或精神得以再现。神州社文化心理中的古人精神,不仅是他们渴望承继的,也是他们展示中国文化的方式。例如,由神州社社员曲凤还、罗海鹏负责访问整理的牟宗三访问记〈为往圣继绝学——谈中国思想史〉,突显了牟宗三作为当代中国思想大家以及承前启后的人文意义。在神州社心中,牟宗三“光畅中国哲学之传统,昭苏民族文化之生命为职志”的自觉,是当今中国人最重要的文化情操。因此,在访问牟宗三的过程中,他们表达了各种的文化情感,既对中国文化的源头、诸子百家的起源与影响、儒家的学问,又对中华民族在思想长河中的曲折与变迁提出了问题。他们通过访问使有关中国古人思想得以展示。

另外,由于受到中国文化思想的影响,他们认为古人圣贤的精神修养为民族精神提供价值支撑。在专辑之二〈横观中国历史〉中,傅乐成〈崇侠尚武·坦荡胸怀·真诚自由——唐人独特的精神〉,认为唐人的精神体现在“勇敢进取的尚武精神”。在这里,中国古人的精神启示了现代中国人应有的文化精神,尤其中国“知识分子”更是他们关注的焦点。可以说,神州社更延续了中国知识分子感时忧国的传统,以及以文学功能改造中国的理想。但却敏锐于知识分子以文学改造社会时的不足和偏误,导致中国文化、中国民族,乃至中国的失落,而他们的中心思想就是背负起中国知识分子过去所犯的错误:把握历史机遇、改造和调整文化、召唤聚集文化伙伴、对文化群众传达文化、复兴中国文化文学与民族的行动,才是最天时地利人和的实践,这种实践即是延续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责任,为中国文化竭尽所能。由此,他们彰显的是中国传统的“儒侠”精神:积极入世的“儒”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士人的形象、“侠”则是救世爱人的情操的人文精神,还有符合“中庸之道”的“知行合一”的中国传统士人的理想状态。(秦轻燕、罗海鹏整理 1979: 25-26)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在神州社的文化情怀中位居首位。他们认为,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是为中国文化进行建立与锤炼,达到一定的形式和程度,成为中国人找到“理”与“势”的根基。

再来,《青年中国杂志》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场域。面对近现代历史,神州社强调中国文化的更新,中国民族的统一以及“中国”的中心位置,就是为了强调民族的位置与重新塑造“中国”的形象。在〈抗战纪念专辑〉〈中美断交反应专文〉里的系列文章,都明显地突显这个文化意图。他们对中日抗战、中美断交等历史事件的叙事,体现了后殖民主义批判和中华民族主义文化诉求。例如,毛铸伦〈抗战纪念专辑之四:血肉筑成的民族长城〉,说:“希望今天中国青年能由灵魂深处建立起刚强的民族主义与同胞意识,至死不渝。中国人只要不失去民族主义,就永远是青年民族,中国人只要不丧失同胞间的互尊互爱,就永远是前进创造的民族。”(毛铸伦 1979: 218)这样的诉求体现了作者对历史苦难中的中国民族主义的期盼,让他们在重塑“中国”形象的过程中,关注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团结同心与持续创新的民族意识。

在神州社看来,他们对于文化与历史的意识,不但非常理解过去的近现代中国,而且看重和把握它的现实性,使他们自觉杂志就是作为民族意识的延续,同时也让他们认清自己在文化进程中的位置,自己与中国的关系。因此尽管“中国”具有特殊的情结中国的色彩,要求中国文化、中国民族甚至“中国”摆脱历史进程中的颓败与沦落的形象,然而他们的杂志就理想而言却是突显民族自信。正如杂志编辑说:“‘抗日

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壮烈最惨烈的一役，外国列强的侵略，使人民意识到‘中国不可辱’的志节，团结一致抵抗外御……‘中美断交’亦来自外国的欺凌，但这断交正好激起我们的尊严”。事实上，这种民族团结和民族尊严，不仅是“自强自立的民族精神”的表现，更是“中国不可辱”的民族标志。（曲凤还主编 1979a：268-269）

综上所述，神州社的《青年中国杂志》是在当代台湾中国文化语境下，对文化、民族、家国情感与自我的文化负担和理想的“中国”体认。它以聚焦传统文化的特质，作为突显“中国”存在的主要形式，并通过他们关于文化理想的实践，以及自我民族与家国情怀，进而重新建立杂志中的传统文化形象，以及赋予“中国”以一个整体特征。正如钟怡雯认为：“华人可从文字、语言、习惯、节庆等共同象征系统凝聚民族意识，并借此召唤出一种强烈的认同。”（钟怡雯 2001a：196）神州社的“中国”认同，即是通过杂志中的“中国”体认得以完成。

四、从“实现理想”到“文化形态”：神州社文化生活与生命情态的建立

温瑞安在〈中国文化与中国人——初论青年中国文化型态之建立〉一文中，认为：“文化应是生活的形态”，而“建立文化模型，就是确立生活的形态和生命情态的基调”。（曲凤还、黄昏星整理 1979：154）温瑞安从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型态着手来建立中国文化，即强调了中国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可能存在和表现形式，而不是用既定的范畴来限定文化，致使它成为一种僵死的文化。不过就神州社的文化生活形态和生命情态的统一性，即可把握他们对中国文化形态之建立的基本态度，也正因为他们深谙“文化内容的独特性并非作家、艺术家的心灵领域可以创造的，必然是透过社会每一个组成份子既有的意识形态相互融通彰显的普遍意识里，方能使民族文化的全幅得到肯定”（李利国 1979：119）的道理，才促成中国文化形态的建立的多重面向：

一、中国文化的开放性。就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来说，无论是接受西化，还是坚守文化本位，在神州社看来都不是中国文化型态建立的有效方法：前者依附外来文化的影响趋势，导致中国文化的迷失；而后者由于深受中国文化心理影响而“抱残守缺”，以致文化僵死。换句话说，神州社对当代中国文化型态的建立抱持明晰的态度。事实上，他们对外来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双向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现代性的力量。正如温瑞安指出“中国文化，能允许矛盾存在，而且要适存现代化”（曲凤还、黄昏星整理 1979：163）一般，开放性意味着中国文化型态的本位化和外来化，即在现代语境中，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产生了相互借鉴、影响与融合的关系，使中国文化更具现代性和活力性。

二、与开放性相联系的是“民族性”特征。所谓“民族性”是针对“民族的感情”甚或“民族的生命”的展示而言的，这种宣称“民族”的原因不仅有民族主义，还有本文第二第三节里的实践理想、文学、文化、艺术、历史等。这种“民族性”型态，是中国文化型态之一，并对身处具体社会结构中的中国人所维持文化力量起作用。诗社成员洪子华认为：“文化是以人为本体，儒家也是以人为本体，文化都是追求民族的生活方式和理想的达成。”（曲凤还、黄昏星整理 1979：160）

三、中国文化型态的建立彰显出了文化主体的情态。在此，他们关注的是文化与文化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因而无限突出中国文化型态对生活形态与个人情态的作用。由

于在文化形态的建立中引申到生活形态与主体情态的途径，从而扩大中国文化型态的文化空间。

事实上，神州社对中国文化形态之建立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了当时台湾学术文化圈的力量。诗社成员胡天任指出：“这一份杂志融合了教授、专家、学者对中国的关心，对文化的剖析，提出概念理想，透过计划编辑的‘青中’杂志，能够成型地带动起整个新中国的文化型态。”（曲凤还、黄昏星整理 1979：142）由此可见，神州社《青年中国杂志》的诞生，以及中国文化型态之建立的基石，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当时台湾的学者文人。身为中国文化倡议者的神州社，之所以仰赖诗社以外的学术文化圈子，除了寻求认同与支持，就是他们更倾向于诗社成员李铁铮所说的：“我们先在文学、组织上扎好根基，而后才提出文化的口号。这是一种深思熟虑后再求发展的做法。”（曲凤还、黄昏星整理 1979：143-144）由于要求先为诗社的文学与组织奠定基础，使神州社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理”（生活形态）与“势”（生命情态）的文化形态。

神州社的“生活形态”主要体现在文化存在和文化表现两个方面。从文化存在形式看，神州社的文化生活主要是文学创作、出版杂志。这些文化生活取决于神州社的文化精神需求，而且一致遵循着创作理念的规律，例如：古典的文学创作；如果从文化表现形式来看，他们的文化生活形态即是学文、习武、座谈会、文化推广等，呈现积极主动的诗社特点。以上两种文化生活已成为神州社日常化的文化活动，秉持统一的信念、情怀、理想而实践，不仅构成神州社文化生活形态的主要部分，甚至俨然内化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此外，神州社的文化生活形态丰富，如诗社的两大节目：“打战”（卖书）和“出征”（拜访其他文学性或非文学性社团）。这些节目成为神州社一种重要的文化活动，虽然组织色彩浓重，但了解其活动目的，能发现活动背后依附着神州社对文化传播的热情。在高信疆看来，这种“激情是必要的，因为它可以刻画生命的深度，它会带来极大的反省和顿悟……我们便要提出方法。然后把它变成生命的常态，变成生活的方式之一，才能一步步完成未来的方向。”（陈剑谁整理 1979：12-13）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情，使神州社的文化生活形态丰富多样，更将它化成《文化中国》专辑之二〈神州文化推广专文〉中的系列文章，继续放射中国文化的能量。

关于神州社的组织形态，有学者认为他们从文学到“政治”，甚至“结党隐居”“行径怪异”。（黄锦树 1996：117）不过在神州社看来，组织结构的完善是“推广文化的有利武器”，因为它遵循和维持的仍是文化形态体系之一；关于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反思，也是有效的，因为全球化趋势使各国文化碰撞交融，而一个文化的韧性与活力就在此得以锤炼。就此而言，神州社的文化形态的建立是一个有益的实践。如前所述，杂志对中国文化形态的建立一开始就是按照中国文化的“理势”目标实践的，在实践和情态上具有向内外放射影响的活力。正如曲凤还强调：“礼、乐是生活教育，而不是徒具虚文的制度；射、御是武术的训练，体魄的锻炼，最后才是知识的追求——书、数，这些，也正是神州的生活，文武合一，术德兼备。今天，我认为要建立文化大国，便须自教育始，教育又需从活生生的生命和生活开始。所以，如颜习斋

所说的‘礼、乐、射、御、书、数’；正是建立文化型态的方式之一。这也正是神州身体力行，与前贤之精神暗合之处。”（曲凤还、黄昏星整理 1979：146）在《青年中国杂志》中，他们尊崇传统中国文化精神的同时，更将理想化为能够在生活中被身体实践的中国。在当代海外华人文学中，神州社是将建立中国文化的宗旨贯穿得最为彻底的诗社，他们也因着“把中国身体化”（魏月萍，2019）而备受争议。

然而，正如社员林云阁所说：“推广的工作，在神州，不是什么运动，而是生活……这对神州人而言，首先是一种从文学上的努力到生活上的实践的训练。它把神州人对中国那份深浓炽热的感情，直接感染于所接触的路人。它的感染力甚至比文学的感染力还大。”（林云阁 1979：207）神州社“从文”“习武”的文化生活形态，以及“推广”文化的影响力，不仅让当时留台马华学子扶风“神往”不已，更认为“那才是大学生活，多姿多彩，文武兼备，团队精神，志同道合。”（扶风 2003：129）从扶风对神州社的组织肯定中，可以看出，神州社的文化推广是行之有效的文化行为，这实际上已接近神州社对生活形态与生命情态的建立的目的。与文化生活形态一样，神州社的“生命情态”也是中国文化赋予他们以生命情态的文化形态之一。在文化形态建立过程中，神州社追求“个体生命的意义”，以“世界文化”超越“民族主义”，表现生命的情态。神州社之所以推崇这种情态，与他们接受的传统文化精神有关。在杂志中，社员洪子华提出中国人的“感情”不仅是中国的文化模型之一，也是中国文化血脉在海外连绵不绝的因素，（曲凤还、黄昏星整理 1979：160）而神州社刚好完整地体现出这种情态。更为重要的是，另一位社员潘眠描则从人为本体的文化情态中寻索出“民族根本”未来发展的底蕴：“中国文化根基，影响外界也受外界影响……我们谈文化，不应怀疑中国文化的生存问题……文化是存在每个人心中的。”（曲凤还、黄昏星整理 1979：160）温瑞安也明确了“生命情态”作为文化形态的一般意义，认为“中国人要求不但要人容人，且要能容物”（曲凤还、黄昏星整理 1979：154），试图将它建立成一种超出人为范畴，真正具有生命情态的中国文化形态。

至于神州社所推崇的“生命情态”，主要体现在人性之“爱”上。他们不仅积极追求中国文化的复兴，还在世界文化中建立起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实际上，神州社文化理想中呈现出中国文化之外更为广阔的“世界文化”，是他们在主体文化和世界文化之间的生命情态的表现。由于先求扎根立足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上，使他们的生命情怀得以向外延申与扩展。从文化思想探索中，神州社这种情怀不是封闭固化的民族本位，也不是中国文化侵略，而是古代中国文化精神熏陶的他们具有仁爱的理想，以及为追求兼爱的人文信念和关怀的精神。在《青年中国杂志》发刊词中，温瑞安强调：神州社“抱持人性的应有态度，去爱我们的民族，去爱我们的国家，乃至全人类。”（温瑞安 1979：5-6）全人类是世界文化的象征，当论及世界文化的时候，人性之爱是神州社思想的核心，可见，人性之爱除了是儒家“仁爱”学说与墨家“兼爱”精神的现代体现，也是他们从个体，爱诗社，爱民族，爱国家，乃至爱世界的生命情态进程，以及世界文化争鸣的企望。这一古代中国文化精神彰显与世界文化的交流过程，也就是具有诗社成员胡天任在座谈文章之〈世界虽大，但我们期望建立自己独特的文化〉一节中，概括了汤因比对中国文化在未来世界文化大潮中的发展趋势：“一是被

西方文化击败，一是反西方文化而建立起自己独特的文化，同时融合别人所长。”（曲凤还、黄昏星整理 1979：162）以这句话反证神州社的文化态度与情态取向，其结果不言自明。

“爱”作为神州社个人情态的象征，又具备世界文化的大同理想与人文内涵。正如汤因比从宗教与哲学的角度探讨“自我中心主义”（利己性）和“爱”（利他性）时，认为生命的正确目的是“克服其天生的自我中心主义，并消灭之。也就是说要舍弃自我。由于这样的努力是与自然相悖的，所以也是很困难的。但是同时，除此以外也再不会有真正充实自己的途经，不会有使自己得到满足和幸福的途经。”（汤因比 1997：13）神州社看似坚持“自我中心主义”的追求，实际上，却以人文情怀“爱”作为衡量“自我中心”的文化准则。例如，温瑞安认为：“文化到最后必定成为‘世界文化’的。我觉得中国文化，能允许矛盾存在，而且要适存现代化，再过了一个时期就会成为目下急病投医的世界所认定的良药。”（曲凤还、黄昏星整理 1979：163）其中所表现出的“自我中心”的中国文化形态，是繁杂混乱的世界文化的模型与“良药”，更是他们追求生命情态的目标。因此，隐含在“自我中心”中的利他性终究成为中国文化形态的建立趋势。由于神州社对“爱民族”“爱国家”“爱全人类”的态度，更以此作为生命情态的目标，就会倡导在世界文化交融中仍能抱持中国文化不卑不亢的中庸形态。这就解决了“自我中心主义”与“爱”之间的矛盾冲突，与神州社文化形态的建立理想是统一的，也是与个体生命情态的意义相联系。值得一提的是，神州社建立中国文化形态的立场是，在本族文化中站稳以后，才能在接受外界影响的同时向外延申发展，不仅保持了中国文化的更新，更维护了世界文化的和谐与多元。正如高信疆所讲：“‘青年中国’要努力的方向即在于此：对生活的现实、社会的状况有一深入的了解和实践，进而提出‘文化造型’的理念，这其实也是一种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一种爱心，一种天下一家的气派。是参予人生介入社会，同时又具有浪漫地个人地创造。”（陈剑谁整理 1979：10）可以说，神州社的生命情态，是对中国文化进行审之于时、观之以史的结果，在他们看来作为道德范畴的“爱”或利他性本身就是追求实现生命情态的最佳文化形态。

最后，神州社的文化形态必然落到“生命”上，因为“儒家思想为中国文化的正统。儒家学问及智慧的创发，自始即落在‘生命’上。所谓道德，尤其是中国的道德，就是如何把真实的生命透露出来，润泽、维护。”（曲凤还、罗海鹏整理 1979：17）换言之，神州社的“知行合一”“知而能行”正是完成生命情态的最好原则。他们强调“知”对中国文化本质的探究和建立，更在“行”的层面意识文化主体对于文化理想的生命意义的审美价值。神州社倾向于生命意义，强调建立文化的过程。他们可以借着“知行”体现出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家国的关怀，同时借着“知行”完善自我理想，并获得自我肯定的生命价值。由此可见，神州社的“知行合一”注重文化主体对建立中国文化的作用，通过文学形式提升中国文化的形态，并最终达到“理想的中国人应是知感合一的”（曲凤还主编 1979a：24）的理想追求。与此同时，迈向理想的经历与过程，也赋予文化主体的生命以价值和意义。从实践文化理想到实现主体价值，不论是文化主体的情感塑造了文化，还是文化造就了主体生命意义，“知行合一”的

理念不仅不再局限于文化功能，还突出了主体的情感意义，甚至将它上升至情感审美的高度。

正如《青年中国杂志》的办刊词中，神州社表现实践理想的文化行为，更是被温瑞安提升为主体生命意义的体现，“一个生命的意义，重要的是确立目标，但能否达到目的，并不比过程重要，努力寻取的过程才是最珍贵的。息西佛斯推石上山的神话，石头到山顶又滚落下来，但推石就成为他最重要的过程，这过程甚至就是目的。夸父追日、愚公移山，其意义不是日追不迫得及？山可不可移？而是在实践中曾经追过日，理念上曾经移过山。”（温瑞安 1979：5）在这里，实践理想的过程重于目的，甚至成为了文化主体追求实现生命的过程。神州社对理想与实践的认知与确立，于是发生了更为超越现实文化因素的层次，其实践文化的理想也由一种自觉的文化情怀，转变对文化主体生命意义的阐发，而这过程中，神州社的奋力实践理想的目的对文化主体的生命意义，起到了超越理想与情感升华的作用。

五、结语

神州社《青年中国杂志》对中国文化的展望，随着诗社解散而坍塌，但他们试图经由文学文化杂志建立中国文化，进而寻找出路，甚至是能够立足于世界的路径。与此同时，他们秉持实践文化理想的行为，更突显了文化主体自身对于文化精神价值的追求，以致能将主体情感移植于“中国”，赋予它文化形态与生命情态的功能和经验，使他们能在文化与文学之间游刃有余，并通过中国文化与主体生命、民族和家国与世界的话语转换，将神州社的文化理想贯穿始终，从而使《青年中国杂志》所建立的中国文化形态得以最大化呈现。

参考文献

- 陈剑谁，1979，〈致广大而尽精微——访高信疆先生〉，《青年中国》，台北：神州出版社。
- 陈剑谁，1979a，〈表现现在，展望未来——青年中国的小说〉，《青年中国》，台北：神州出版社。
- [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著，苟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1997，《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杜晋轩，2020，《血统的原罪：被遗忘的白色恐怖东南亚受难者》，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
- 扶风，2003，〈神州诗社〉，《蕉风》，第491期，页129-130。
- 古素娥，1979，〈神州、中国、秋海棠〉，《文化中国》，台北：神州出版社。
- 黄锦树，1998，《马华文学与中国性》，台北：元尊文化。
- 李利国，1979，〈害莫大于浮浅——文化中国重建的根本反省〉，《文化中国》，台北：神州出版社。
- 林瑞明，1993，《台湾文学与时代精神：赖和研究论集》，台北：允晨文化。
- 林云阁，1979，〈从推广中坚定对中国的情感——推广给予社员的训练〉，《文化中国》，台北：神州出版社。
- 毛铸伦，1979，〈抗战纪念专辑之四：血肉筑成的民族长城〉，《青年中国》，台北：神州出版社。

- 秦轻燕、罗海鹏整理, 1979, 〈极高明而道中庸——陈晓林先生访问记〉, 《青年中国》, 台北: 神州出版社。
- 曲凤还主编, 1979a, 《青年中国》, 台北: 神州出版社。
- 曲凤还主编, 1979b, 《历史中国》, 台北: 神州出版社。
- 曲凤还主编, 1979c, 《文化中国》, 台北: 神州出版社。
- 曲凤还、黄昏星整理, 1979, 〈中国文化与中国人——初论青年中国文化型态之建立〉, 《文化中国》, 台北: 神州出版社。
- 曲凤还、罗海鹏整理, 1979, 〈为往圣继绝学——访牟宗三先生〉, 《历史中国》, 台北: 神州出版社。
- 王伟, 1979, 〈长安不见使人愁〉, 《文化中国》, 台北: 神州出版社。
- 魏月萍, 2019, 《当代评论 留学生的认同与实践: 神州诗社文学记忆的回望》, 2020年9月26日阅自<http://contemporary-review.com.my/2019/09/29/1-208/>
- 温任平, 2012, 〈神州诗社: 乌托邦除魅兼序李宗舜散文集〉, 李宗舜著, 《乌托邦幻灭王国: 黄昏星在神州诗社的岁月》, 台北: 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温瑞安, 1979, 〈发刊词〉, 《青年中国》, 台北: 神州出版社。
- 温瑞安, 1979a, 〈青年中国的文学〉, 《青年中国》, 台北: 神州出版社。
- 许文荣, 2004, 《南方喧哗——马华文学的政治抵抗诗学》, 新山: 南方学院出版社。
- 杨照, 1993, 〈发现“中国”(台湾的70年代)下〉, 《中国时报》, 7月20日, 人间副刊、70年代专辑4。
- 张晓风, 1979, 〈建立文化大国专题系列之十: 愈合的桂树——寄拉佛斐尔先生〉, 《文化中国》, 台北: 神州出版社。
- 钟怡雯, 2001, 《亚洲华文散文的中国图象(1949-1999)》, 台北: 万楼卷。
- 钟怡雯, 2001a, 〈从追寻到伪装——马华散文的中国图像〉, 许文荣主编, 《回首八十载、走向新世纪: 九九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新山: 南方学院。